

GU DIAN MING ZHU
BIAO ZHUN DU BEN

论语译注

古典名著标准读本

原著·〔春秋〕孔丘

译注·杨伯峻 杨逢彬



《论语》是一部智慧宝典，也是一部道德圣经。而杨伯峻、杨逢彬先生的《论语译注》深入浅出，既可供专家研究之用，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是目前质量最高、流行最广的版本，也是一部经典诠释的经典。



岳麓书社

出版

中国哲学名著译注丛书

论语译注

（精）

杨伯峻 著
李零 校注
（增订本）



000000

GU DIAN MING ZHU

BIAO ZHUN

DU BEN

论语译注

古典名著标准读本



原著◇〔春秋〕孔丘

译注◇杨伯峻 杨逢彬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译注/杨伯峻,杨逢彬注译. —长沙:岳麓书社,
2009

ISBN 978-7-80761-180-6

I. 论... II. ①杨... ②杨... III. ①儒家②论语
—注释③论语—译文 IV. B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7304 号

论语译注

作 者:杨伯峻 杨逢彬

责任编辑:蒋 浩

封面设计:山和水设计工作室 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字数:175 千字

印数:1—8,000

ISBN 978-7-80761-180-6/G·696

定价:12.00 元

承印:长沙银都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导 言

杨伯峻先生的名著《论语译注》是目前质量最高、流行最广的《论语》译注本,它深入浅出,既可供专家作研究之用,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因而广受欢迎。

《论语》是用先秦时期的汉语写成的。如果不懂一点普通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不懂一点文字音韵训诂的常识,便试图给《论语》作出新的解释,无疑是不会成功的。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坊间的许多《论语》注本之所以不成功而错误百出,即由于注释者缺乏普通语言学基本知识与文字音韵训诂的常识。市面上流行的一些随意给《论语》中某句话断句或给某些字词作出“新解”的注本,大多如此。还有某些注本沿袭一些由来已久的错误,如读“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乐”为ào,为杨伯峻先生所不取,却还有人好意地“纠错”。

可见,读《论语》,选取一个好的注本,是何等重要。

杨伯峻先生注《论语》的时候,没有计算机,没有相关软件,以他老人家学问的广博与精深,白璧微瑕、千虑一失仍在所难免;我们用杨先生倡导的语言学方法和文字音韵训诂知识,辅以计算机检索手段,对古今注释《论语》的大学者看法有所歧异的地方,进行全面的调查,以得出正确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这样不可避免地对《论语译注》的少数地方有



所修正。例如,《卫灵公篇》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忍”,历来有忍心、忍耐两种解释,而杨先生选取后者。我们通过计算机全面检索发现,从《论语》、《左传》时代直到《史记》时代,凡是不带宾语的“不忍”,都是“不忍心”的意思;因而,“小不忍,则乱大谋”意为“小小的仁慈,有时会败坏大事情”。

看到这里,如果读者朋友还有耐心,请看下文较为详尽的解说。

如前所述,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论语》注译本,毫无疑问,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公认是最好的。不但公众这样认为,学术界也同样如此。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就曾撰写专文,赞誉《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为同类著作的典范。杨先生译注《论语》为什么能做到最好呢?这得力于他的知识结构。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文献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语法学上的贡献尤其突出。译注《论语》须得力于熟悉古代文献,这是无需多讲的。那么为什么注译好《论语》还必须借重于掌握语言学特别是语法学呢?《论语》是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接近于当时口语的汉语写的,研究《论语》实际上就是研究当时的汉语(一般称之为“上古汉语”);上古汉语当然也是属于语言研究的范畴,因此当然应该懂一点普通语言学即语言内部的最普遍的规律才可言及“研究”;语言最基本的规律是,它具有社会性,它具有历史性。我们总结这两点基本规律,就是切忌“盲人摸象”,切忌“刻舟求剑”。还是通过例子来说明它吧。

有人认为,如果孔子说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话,岂不是推行愚民政策吗?于是觉得应该这样读:“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是，语言是具有社会性的。在某一社群中生活的个人，如果想与别人交流，就不能说些让谁也听不懂的话。因此，无论是词语还是句式，在某一时代的某一社群，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说法是带有普遍性的，如《孟子·尽心上》就有“民可使富也”这样的话，《左传》庄公十六年也有“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这样的话；相反，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类似的话在那一时代的典籍中就找不到。首先，找不到“民可”这样的主语直接接上“可”作谓语的例证；其次，正如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指出的，当时没有“使由之”“使知之”这样承接上文的，通常应为“则使由之”“则使知之”。因此，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靠不住的。正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决定了某词的每一含义和每一用法一定是“无独有偶”的。某学者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并解释说这一句中的“女子”为“你这位先生”。将这一说法拿到先秦典籍中去验证，找不到任何另外一例可以证明它，这就决定了这个说法一定是不可靠的。由此可知，如果我们对古书如何读有“新颖可喜”的想法，一定要拿到那一时代的语言中去验证，看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一验证就好比观察一头大象，一定要站在一定距离之外从各个角度看它，才能对它的轮廓有个大致的了解。如果不加以必要的验证而“自说自话”，那就好比“盲人摸象”，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类似的对《论语》来一通盲人摸象的还有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读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以及“唯女（汝）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刻舟求剑”忽略了船在河中是移动的，语言，包括其中各个要素如语法、语音以及词汇，从古至今也是不断变化的；忽略了这种变化，以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去理解古代汉语，就好比刻舟求剑。不同的是，在船舷上刻记号，等船移动了再去捞剑的人，大家都说是傻瓜，而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去理解古代汉语的人却比比皆是，其中还不乏著名人士。例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信”，在《论语》时代，有诚信、守信、相信等意义，可是却没有“信仰”义；但却有人解释“民无信不立”为“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云云。《庄子·秋水》中的“望洋向若而叹”的“望洋”是连绵词，仰视貌；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却“望文生义”，说就是“望着海洋”；可是“洋”之有“海洋”义是北宋才开始的。

其实古人也不大明白语言是变化的，他们经常犯“刻舟求剑”的错误；直到明代的陈第才说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这样清醒的话，但陈第以前的人不大懂得这个道理。今天读《诗经》，有些该押韵的地方却不大押韵，我们明白是语音变化了的缘故；可是六朝到宋代的人却不明白此理，他们以为古今语音是一贯不变的，当时不押韵的字，《诗经》时代也不押韵。但作诗必须押韵，于是他们帮他们的古人解决这一难题，这便是“叶（读作 xié）音”。所谓“叶音”就是六朝到宋代的人们认为，上古时的人临时改变一个或几个韵脚字的读音，来使诗歌押韵。语言学的一个起码的原则是，语言是具有“强制性”的，任何人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信您可以把“好”读作 huài 试试，早上见到熟人即打招呼道：“嗨，ni huài！”看会是个什么



结果。因此，叶音说是荒谬的。《经典释文》中记载了《诗经·关雎》中“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一句中“乐”的叶音为五教切或义效切，就是读作 ào 或者 yào，来和前面的“芼”（音 mào）押韵。古代有些字书、韵书就把“乐”的这两个读音记录下来，说“乐”也读作 ào 或者 yào，意为“爱好”。杨伯峻先生当然明白叶音荒谬这个道理，虽然他在《论语译注》附录的《论语词典》中注释“乐，旧或读五教切”，可是在诸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正文中他并未出注，表示并不赞同读为 ào，那么理所当然应当读作 lè，意动用法，智者以水为乐，仁者以山为乐的意思。如果读 ào，意为爱好，那么“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该如何理解呢？

语言学的另一个原则是“约定俗成”，那么不管某个字或词的意义或读音，其来源如何荒诞不经，只要它为现今大多数人所接受，就是正确的。“知者乐水”的“乐”之读为 ào，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比较好的《论语》注本，如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都不注“乐”应读五教切。可见，杨伯峻先生的不注“乐”读为 ào，正体现了他的深厚的文献学和语言学素养。

我们以为，将这些地方改正过来，将使得这一注本对《论语》原文的理解较旧版《论语译注》更为贴切。

上世纪 90 年代初，经过杨伯峻先生授权，笔者在《论语译注》的基础上编写成岳麓书社后来出版的《十三经今注今译》的《论语》、《孟子》部分，以杨先生和笔者共同署名。后来岳麓书社将这两部分作为“国学基本丛书”的《论语》和《孟子》出了单行本。当时勇气可嘉，学力有限，因而这两个单行本实在未能尽善尽美，未必对得起当时已经长眠地下的杨先

生。笔者早就有意修订,这次承岳麓书社提出加以修改重版,当然令笔者欢欣鼓舞。因为整个注本还是以《论语译注》为基础,当然应该一仍其旧,将杨伯峻先生列于笔者之前。这是应该郑重说明的。

前言

《论语》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歿，仲尼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大，却出现了不少重复的章节。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比《子罕篇第九》多出十一个字。还有意思相同，文字却有异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有下面这个推论合理：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论语》的作者有孔子的学生。《子罕篇第九》：“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相吻合。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又，《宪问篇第十四》之第一章：“宪问耻。子曰：‘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宪”是原宪，字子思。显然，这也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的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的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如《泰伯篇第八》的第三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一章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



子骞！人不问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阒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我认为这一章是闵损的学生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这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个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到“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这点，在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后才称“夫子”。只是在《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都是当面称“夫子”，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论语》着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论语》一书的最后编者，应是曾参的学生。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较孔子其他弟子为多。《论语》中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共有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

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前436年），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记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着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订，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答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就是这些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号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遵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馀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略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今天，我们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



就是《张侯论》。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就是用何晏《集解》和宋人邢昺（932—1010，《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清史稿》有传）的《经义考》、纪昀（1724—1805）等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作《集注》。从明朝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

“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另外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故这书无妨参看。

(3) 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清代儒生多不满意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后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为刘宝楠父子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昔日的好书，今天亦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

(4) 程树德(1877—1944)《论语集释》，征引书籍达六百八十种，虽仍有疏略可商之处，因其广征博引，故可参考。

(5) 杨树达(1885—1956)《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目 录

导 言	(001)
前 言	(001)
学而篇第一	(001)
为政篇第二	(010)
八佾篇第三	(022)
里仁篇第四	(036)
公冶长篇第五	(046)
雍也篇第六	(060)
述而篇第七	(074)
泰伯篇第八	(089)
子罕篇第九	(099)
乡党篇第十	(112)
先进篇第十一	(121)
颜渊篇第十二	(136)
子路篇第十三	(149)
宪问篇第十四	(164)
卫灵公篇第十五	(185)
季氏篇第十六	(200)
阳货篇第十七	(209)



001

